

## 两千年前丝绸外销的见证者——汉代鎏金铜蚕

1984年，陕西石泉县池河镇的村民谭福全在池河边挖沙淘金时，发现了一条黄灿灿的金蚕。这件金蚕首尾九节，呈昂首吐丝状，经文物专家鉴定，确定其为汉代的“鎏金铜蚕”。蚕茧是丝绸的来源，鎏金铜蚕与丝织肯定有莫大的关系，那么它为何发现于石泉，与古代的丝绸之路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从石泉县的县志来看，这里的养蚕缫丝业在汉代已经极为发达，不仅蚕户众多，还建有不少官营的大作坊，出产的丝织品花纹多样，做工精致。石泉县境内有一条通往西域丝绸之路的子午古道，它南至石泉县池河镇，北至长安的子午谷。通过这条古道，汉中地区的丝绸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往长安，再由长安经丝绸之路，穿中、西亚，直达欧、非。有着子午古道这样的商路动脉，结合自身发达的丝织业，石泉县应是汉代丝绸外销的重要原产地。

据说，张骞凿空西域开启丝绸之路后，受到汉武帝的嘉许，准许其回到陕西汉中的老家省亲。省亲的过程中，张骞看到池河岸边遍植桑麻，周边区域还有不少纺织作坊。省亲结束后，张骞把池河周边老百姓养蚕织丝、安居乐业的见闻上报给汉武帝，并给武帝讲起先秦时蜀王蚕丛氏为鼓励农桑，曾铸造数千只金蚕送予蚕户祭拜，以祈盼蚕丝丰收的故事。汉武帝听后龙颜大悦，随即下令朝廷铸造“鎏金铜蚕”，奖励给养蚕纺织大户。石泉县发现的这件鎏金铜蚕从其鎏金的工艺和材质来看，无疑是官家铸造，很可能就是汉代统治者御赐给当地蚕户的奖品。

丝绸曾以独特的文化符号代表着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史载古罗马皇帝恺撒曾与宫廷大臣去剧院看戏，当观众们看到恺撒穿的中国丝绸织造的衣服时，全都被其华丽精美的质地所倾倒。“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古罗马人对丝绸的狂热是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的，据说古罗马曾经用全国税收的三分之一来购买中国的丝绸。所以鎏金铜蚕即便不是张骞建议铸造，丝绸外销的需求也很可能促使汉朝统治者铸造蚕神的化身——金蚕，赠予蚕户，从而让蚕户通过精神层面的祈祷来确保丝织业的稳定发展，由此获取巨大的外贸收益。

小巧灵动的鎏金铜蚕背后，反映的是汉代丝绸之路的繁盛。精致华美的丝绸途经西亚行销欧非，鎏金铜蚕也见证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大规模的商贸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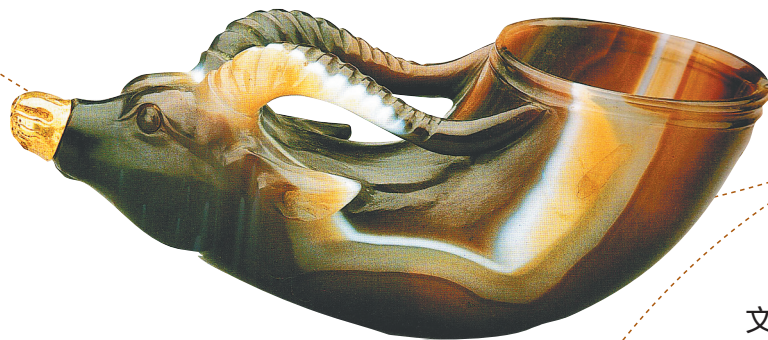


### 丝路遗珍 文物

延绵两千年的丝绸之路，无论是陆路还是海上都留下了无数的丝路遗珍，它们承载着沿线国家的历史。作为当时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亲历者，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有着不能被时间淹没的丝路故事。

## 文物中的丝路印迹

文本刊特约撰稿 刘亭亭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兽首玛瑙杯。

### 充满异域风情的丝路舶来品——兽首玛瑙杯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再现了长安作为丝路中心城市的神秘与繁华，剧中曾提到何家村埋藏有金器。在现实的考古发掘中，西安何家村确实出土了一批金器，不过盛唐时候何家村可能另有其名，地理范围上应属于唐长安城兴化坊的范围。除金器外，何家村还出土有银器、玉器和玛瑙器等，鎏金兽首玛瑙杯便是其中具有独特异域风情的国宝级文物之一。

不少学者认为鎏金兽首玛瑙杯的材质产自中亚、西亚地区，被商旅或使团经由丝绸之路带到大唐。它是由一整块玛瑙原料依势象形设计出的角杯形制，并巧妙地利用自然的纹理雕刻出兽首俏色，兽首的双眼圆睁，修长的螺旋形双角弯曲着伸向杯口两侧。兽嘴作鎏金处理，又自然成为杯塞。整体的纹理细腻、造型生动，即便在各国珍宝齐聚的唐长安城，想必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角杯在古代中国并不少见，但兽首玛瑙杯这种顶部有流口，以兽首装饰的角杯却不是中国传统的形制。它的造型来源于古希腊的克里特岛，当时的人们称其为“来通”，后来由古希腊传至波斯、中亚以至中国。“来通”常用于古希腊的祭祀活动中，当时的人们相信用“来通”盛酒可以防止中毒，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是对神灵致敬的礼仪。

《旧唐书》中曾记有开元年间西域康国进献过兽首玛瑙杯，康国位于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一带，这件具有异域风情的玛瑙杯很可能就是来自丝绸之路上的舶来品，它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来到大唐，并成为盛唐与丝路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绝美注脚。

### 丝绸之路的产物和文化使者——元青花

由汉至唐，丝绸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流商品。及至宋元，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到全盛时期，瓷器逐步取代丝绸、香料等货物的霸主地位，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另一个重要符号。外销瓷的品类众多，像青白釉、青釉和白釉等瓷器都有着中国最为传统的工艺传承。

元青花在众多外销瓷中显得独树一帜，它虽然也承继中国传统的制瓷业，但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它又是丝绸之路的产物，原因在于元青花釉下彩绘所用的青料苏麻离青来自国外，苏麻离青料发色湛蓝绚丽、飘逸隽永，是通过丝绸之路运到中国，再辗转运至江西景德镇。另外从元青花多大型器物、几何纹的构图和中国传统的绘画等特征来看，它又是伊斯兰文化、蒙元文化和汉族文化交相融合的产物。所以外销的元青花既具有中国古瓷独有的审美意韵，又结合了出口国人们的使用习惯，这种附带文化属性的瓷器成为诸多外销商品中最受喜爱的文化使者之一。

由于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和元青花独有的文化魅力，使得现今很多珍贵的元青花散落于丝路沿线的土耳其、伊朗等国。像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宫收藏元青花完整器有40件之多，是世界上收藏元青花最多的机构，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32件，位居第二。作为元青花原产地，中国收藏元青花最多的机构高安博物馆也只能排在第三。此外，像日本、印度和不少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西沙群岛石屿二号沉船中都出土和出水有元青花的残片，这也说明元青花曾循着丝路贸易，到达过许多国家和地区。

满载着丝绸和元青花等货物的驼队与福船，带去的不仅是令西方为之惊叹的中国商品，更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互通，这也使得当时中外文化和贸易达到了一个空前的融合期。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青底白花凤凰穿花纹菱口盘。

### 文化交流大融合的代表——骆驼载乐俑

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的展厅中，陈列有一件唐三彩的骆驼载乐俑。骆驼昂首挺立，背上驮载有五个戴帽的成年男子，中间深目高鼻、髯须浓密的胡人像是一位歌者抑或舞蹈家，其余四人围坐演奏。演奏者们的乐器仅残留一把琵琶，据考古学家考证，其余一人吹笙箫，二人击鼓，均是唐代常见的胡人乐器。这件唐三彩巧妙地夸张了人与驼的比例，造型优美协调，是唐代三彩艺术的珍品之作。

元稹曾作诗云“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骆驼载乐俑中展现的多人奏乐起舞的场景，融合了唐代胡人的杂技和乐舞，可能是当时长安城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驼俑上的胡人乐者等文化使者，使得胡风东渐，为长安带来别样的异域风情。像胡人乐者这样钦慕大唐的盛世繁华，不远万里从丝路来到长安和洛阳的人还有很多。比如日本遣唐使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因慕唐风，改名晁衡，后因学业出众考中进士，还成了唐朝官员。

骆驼载乐俑中的负重骆驼和髯须浓密的胡俑形象，不禁让人回想起当年丝绸之路上驼铃声响、大漠落日的情景，一列列驼队用一个一个脚印，走出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大融合。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片)